

学习毛泽东的『办报思想』

□ 宋庆伟

众路线。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忽视对城市贫民之取得、忽视对妇女群众的宣传和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办《时事简报》的要求，并于1931年3月亲自草拟和颁布《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告》，指出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守旧观点”。在文风和通俗性上，毛泽东要求用本地的土话，“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以便于群众阅读。在宣传内容上，毛泽东强调要多报道“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新闻，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等，这样“群众一定喜欢看”。在篇幅和字体上，毛泽东规定“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要用“极大黑墨字”，这样才能“看上去明明白朗”，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读物”，群众“既看了报又识了字”。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报刊宣传要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原则。他严肃批评了《解放日报》“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错误，并亲自题写“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字方针，以督促《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报刊宣传中的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群众生活，使群众在阅读报刊后能够“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二是在研究党的政策的基础上，在报刊中解读和宣传党的政策，表明党的立场。从而达到“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的宣传目的。

“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毛泽东多次强调“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集中火力配合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和擅长借助党的报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打宣传战。如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党内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要求动员报纸、刊物、通讯社等向前线官兵和全国人民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的抗战理念，并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宣传方针：一是宣传抗战典型（平型关、台儿庄等）；二是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三是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以提高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再如，1943年国民党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组织宣传反击战并要求各地报纸、通讯社揭发国民党的阴谋从而达到“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分子”的目的，以“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计划胎死腹中。此外，由于党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时刻变化着的，因此毛泽东也十分重视观察形势变化以制定正确的宣传方针。如1946年5月22日，为配合政治谈判，毛泽东致信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余光生：“从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暂停广播”。同年6月23日，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迅速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为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再次致信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集中火力“予以揭露”，有力地声援了中原突围。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

毛泽东认为报纸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编辑和记者队伍的质量。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要“改造宣传队员成分”，以“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两种渠道来充实红军的宣传队伍，并要求政治部“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员的计划”，以“改进宣传员的质量”。延安时期，为提高办报质量，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拟定第四版的征稿办法，并挑选专家编辑队伍负责组稿工作。如：范文澜负责历史主题，每月组稿12000字；艾思奇负责文化和哲学主题，每月组稿10000字；周扬负责文艺批评主题，每月组稿10000字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参加编辑人员的座谈会并指导他们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如1948年4月召开的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求编辑和记者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担负教育群众的任务”。在文法和文风上，毛泽东提倡在对编辑进行教育时应选择几篇合乎标准的文件材料作为范例，使他们熟练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依旧注重编辑和记者队伍的培养工作，他强调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只有这样“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首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既是当时形势所致又是个人自觉。一方面，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处于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曙光，急需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眼中《共产党宣言》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另一方面，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陈望道看来，翻译《共产党宣言》义不容辞。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陈望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此外，深厚的英语和日语功底以及良好的汉语语言文学修养更使陈望道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不二人选。

为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于1920年2月回到浙江义乌家中，他根据日文版，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共产党宣言》。在一间柴屋里，陈望道克服工作条件的艰苦和翻译中的困难，“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彻底全文译了出来”。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译稿。《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共产党宣言》经过多次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

陈望道：尝透“真理的味道”

□ 张曙光

了。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宣言》在北伐军中广泛流传。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曾讲：“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该书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

积极参与建党早期活动

在译完《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担任《新青年》主编的陈望道对杂志采取了一种“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如他自己所说：“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新青年》这一办刊方向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提出要改变刊物性质甚至停办，但陈望道毫不妥协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面对改良主义者张东荪借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陈望道发表文章与之坚决斗争。通过与胡适、张东荪等人的论战，陈望道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有力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

质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望道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发起人，直接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两个组织可看作党创建时期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陈望道和其他同志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内容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在组织支持下，他开办外国语学校、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国语学校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活动的场所，为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培养了大批干部。平民女校是吸收“一些觉悟的女子，为反对三从四德，被他们的家庭、学校赶出来，我们办学校，接受他们。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陈望道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直接参与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邮电工会，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为此，陈望道多次向工人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进行鼓动宣传工作。

诠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无论时局如何变换，陈望道一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用一生的

坚守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陈望道毕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即使如此，陈望道依然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党创立的学校——中华艺术大学校长，随后在这所学校诞生了著名的“左联”。抗日战争时期，陈望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在“孤岛”上海坚持敌后斗争。1940年陈望道随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后，根据党的指示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馆，新闻馆里可以传阅革命书刊、收听延安的广播，被称为“夏坝的延安”。解放战争时期，陈望道参与组建了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大学教授联合会”，并担任主席，大力推动“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运动，同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作家和进步学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陈望道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作为一名学者，陈望道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一部《修辞学发凡》被称为“千古不朽的巨著”。在书中陈望道既以大量篇幅谈了修辞技巧，又着重说明了它与内容的关系，突出了修辞的目的——为内容服务，把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运用到修辞中。

纵观陈望道一生，一旦尝过了“真理的味道”，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从未改变，也正是信仰的初心使其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践行者和坚守者的使命。



转战陕北的神秘“四大队”

□ 孙越霄

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

5月初，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大捷。胡宗南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气得说不出话来。5月14日，陕北军民在安塞真武洞举行蟠龙战役庆祝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消息由“四大队”发到新华社总社，第二天播发出去。老百姓知道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备受鼓舞，坚定了必胜的信心。10月10日，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历史性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修改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类文稿达70多篇，这些由陕北发出的红色电波，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促成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关键布局。

更高的工作标准

在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陕北布局整个解放战争，需要研究大量资料辅助决策。“四大队”还承担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社、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的工作，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党中央决策参考，相当于部分智库的功能。

每天，“四大队”都要报给中央一大叠抄收到的中外文电讯。退

回的电讯上面都有中央领导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符号和批注。中央给“四大队”送的每篇社论、评论等，都用钢笔抄写，字迹清晰，标点准确，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对“四大队”工作人员触动很大。范长江说：“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

在党中央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四大队”的工作态度愈发严肃认真。为保证向太行总社的发电不译错，他们在文章译好后，由译电员读电码稿，包括标点符号、负责编辑看着原稿听。人名、地名和同音易混的字反复核对，以保证译码无误，然后交电台发出。总社口语广播重要文章时，他们手持原稿对照收听，严格把关每个环节，仔细反复核对，以确保准确、及时地播发党中央的声音。

一生难忘的日子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有时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遭到敌人前后夹击，仅大的转移就有8次。一孔窑洞就是办公室，门板、灶台和磨盘就是办公桌。一到宿营地，电台同志立即架线抄收新闻电讯，编译人员就在炕沿、灶台甚至膝盖上进行编译，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

况下工作。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胡宗南，不仅派飞机四处侦察，还悬赏30万元监测毛泽东的电台。为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

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路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报告毛泽东。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驻地在王家湾，而这正是胡宗南部袭击马路沟的必经之地。中央立刻命令向山上转移。敌军步步紧追，狂风暴雨大作，山路崎岖泥泞，其他大队都已进山，怕新华社同志走错路，毛泽东、周恩来留在山口焦急地等待“四大队”，直到看到他们都赶上来，才放心一起上了山。

陕北的声音维系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聚焦着所有人的目光。1948年春，范长江率领“四大队”跟随党中央离开陕北。他后来回忆：“这一年多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20余万人。经过我手发过《毛泽东选集》上的许多重要文件，亲眼看到全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虽然经过不少惊涛骇浪，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一生难忘的日子。”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一贯坚持报刊宣传要坚持走群